

第五章 重入轮船招商局， 富强救国热情高涨

一、郑观应与盛宣怀亲密关系的开端

郑观应从 1884 年春辞离轮船招商局奔赴抗法前线，到 1892 年冬重入招商局，中隔 9 年时间。郑观应第二次入局，与他和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的关系分不开。

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从现象看是很复杂的，但从本质上说，郑把盛看作是他的“商战”主张的实现者，盛则把郑看作是他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得力帮手。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郑观应和盛宣怀对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太同小异，尤其是对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首先，他们两人都有比较强烈的开采矿藏，兴办电报、轮船和其他轻工业等近代企业的愿望。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讲到的，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盛宣怀大力勘查长江中游和山东等地煤炭五

金矿产，郑观应极力支持，并多次要求盛宣怀联名稟请有关督抚批准集股开采，并雄心勃勃地与盛宣怀一样“拟一手揽尽，不为他人所得”^[1]。其次，郑、盛都是商本商办的主张者。郑观应坚定地主张商本商办近代企业，本书在前四章已言之甚详，无庸赘述；盛宣怀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里要稍多说几句。盛宣怀参与创办的第一个洋务企业是轮船招商局，还在1872年筹建之初，盛即极力提倡招集商股，并为此而与“领官项”主张者朱其昂发生矛盾，说“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本，其稍有异同之处”^[2]。此后在集商股创办矿务、电报、纺织等企业上，郑与盛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到90年代初，他们对张之洞官办汉阳铁厂联合企业持否定态度，而主张商股商办的观点又是一致的^[3]。郑与盛之所以对发展近代工业企业有共同性，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和尽可能高的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尽管他们各自经历和某些出发点不同。第三，郑观应和盛宣怀在“与洋商争利”这一点上也有一致性。仍以轮船航运业为例。郑观应对洋船在长江“喧宾夺主”的情况极为反感，提出“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4]。盛宣怀则说，轮船航运“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5]。在其他企业的创办上，郑、盛也都有相同的抵制洋商经济侵略的意图^[6]。

由于郑观应和盛宣怀有关创办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观点相同，加之他们之间又有实现“商战主张”，和倚为“得力帮手”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一面，所以他们的

关系非比寻常是很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因郑观应的穷困在加深着。1884年郑观应因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赔款，请盛宣怀“垂怜苦况”，盛则“慨允”为之“力挽危局”^[7]。郑观应得以结案解脱，得盛之力殊多。郑观应对盛宣怀的尽力“排解”和“慨助银两千两”，“感愧”有加^[8]。郑观应后来回顾盛宣怀对他的“垂念穷交，不以盛衰有异代为了结”“布局之累”的恩情，感激涕零^[9]。郑观应因受杨桂轩亏欠的连累被太古控追拘禁于香港之事于1885年夏解决后，闲居于澳门，贫病交加，盛宣怀不时赐金。郑观应对盛宣怀“俯念拮据之况”，也是“不胜感谢之至”^[10]。

盛宣怀不仅在经济上对郑观应不时加以援助，对于郑观应重新出来工作也是关注的。而在澳门基本上过着隐居生活的郑观应，除从事《盛世危言》的辑著外，也做一点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并辑著成《中外卫生要旨》，但无公职没有经济收入，生活成为问题。所以他本“欲息影蓬庐，潜心邱索，（但）迫于家贫亲老，欲罢不能”^[11]，只能找个职务。他一再致书盛宣怀，要求委派一个差使，以期稍微摆脱穷困。1886年，盛宣怀委郑办云南电线事务。郑观应致书盛宣怀说：“回忆在沪诸荷栽培，周旋捍御，今又蒙不遗葑菲，垂念寒微，代为策划，委赴云南，虑深致远，弥笃风义，感激之私，沦肌浹髓，敢不勉竭疲弩，仰副盛怀。”^[12]他表示即日束装就道，“不敢稽延”^[13]，但终于因故未能就职。1890年秋，郑观应因病到“羊城就医，……适省中造纸局办理不前，各友集股合办”，唐廷枢等人邀郑入局总理。郑则以

“才力俱拙，精力亦衰，不敢再为冯妇”而“婉辞”^[14]。

郑观应未去办滇南电务，是因为远离广东，于“事亲养病”不利；不肯总理广州造纸局，是由于责任太重，成败未可预卜，且非盛宣怀所直接经营。郑观应另有打算。他于1891年2月在广州面见盛宣怀时，即表达过“报效之忧”^[15]，接着又致书盛宣怀说：“如阁下于粤处有事差委，尽可效劳。每念鲍叔高谊，不悉何以报之。”^[16]事实上盛宣怀在郑观应写这封信之前半个月，已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代理总办开平煤矿粤局销售煤炭事宜了。盛宣怀在推荐的禀告中对郑观应推崇备至，说郑在办轮、电二局时“颇著勤劳，商情信服。至织布局因公受累之款，概已筹垫清还”，委派他代为经理开平粤局是适宜的，因为“该道办事勤慎，并熟悉中外商情，于地方亦颇合宜”^[17]。郑观应于1891年4月18日（光绪十七年三月初十日）奉到了总办开平粤局的委札，其任务是购地建厂，填筑码头，购备轮船两艘，把开平煤炭运往广东推销，再从广东“装客货回津”^[18]。郑观应于奉委札后即着手招股购轮，兴筑码头栈房。于是闲居多年的郑观应，又忙碌起来了。

郑观应对盛宣怀、唐廷枢等人为他谋到这个差事使其“藉得薪水，稍帮家务，以慰亲心”表示感激。这时，盛宣怀有意要委派他去办理利国驿煤矿事务，郑观应以“非废员可办”力辞，而请求委派他在两广经营电报局事务；如果在广东还有什么别的差使的话，他亦愿就。因为这可以做到“公事之外，事亲养病，犹得两全”^[19]。

然而，盛宣怀是不会把郑观应这个有经济理论和商战经验丰富的人置于小小的开平粤局中，而是要把他放到更需要更重要的岗位上来的。在当时，这样的岗位莫过于轮船招商局。

二、重入轮船招商局的直接原因

轮船招商局自郑观应于 1882 年第一次入局后，经营日有起色，他是起到很大作用的。经过 1884 年中法战争中的换旗，1885 年局产赎回后，复与太古、怡和重申了 1883 年签订的齐价合同。1890 年六年合同期满，怡、太削价竞争，加上“野鸡船”的争载，招商局的票面 100 两的股票跌到了 60 馀两。尽管 1892 年二、三月间招商局与怡和、太古签订了五年齐价合同，纠纷还是不少，怡、太且有反悔之意。商局营业没有起色，盛宣怀这个督办着急了，他想起了这位善于经营船务的能干的老朋友郑观应。1892 年 6 月间，任山东登莱青道的盛宣怀致电在广东的堂弟盛宙怀（荔荪），要他即请正在总办开平粤局的郑观应赶赴烟台，商议轮船三公司和局一事。郑观应随即致书盛宣怀说：“辱蒙鲍叔知我，不弃瑕瑜，何敢自外，即当勉竭驽骀，图报知己”^[20]，并表达了他如何进行“和”“战”的观点。他说：

“和议何难之有？古云：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遽能和也。善夫！公法有云：势均力敌，而后和议可久。今若事事迁就以求和好，彼

见我中怯必有要求，势必致吃亏而后和。”^[21]

这就是说，轮船招商局要能站稳脚跟，必须从增强自己的力量下手；要处于进攻的地位，不能迁就退让以求和，而应在能战能守中制服敌人，然后和始可恃；只有辩证地认识“和”与“战”的关系并运用于商战，方能克敌致胜。

1892年8、9月间，郑观应从广州前往烟台、天津^[22]，与盛宣怀等招商局同事“晤谈数日”。盛宣怀称赞郑观应“商情颇称熟习”，随即稟请李鸿章札委郑为招商局帮办，专管揽载、修舱、煤料、缮译诸股。当时有人向盛宣怀进言，说郑观应已经“报穷”^[23]，忽然当起了招商局帮办，恐有人要向他索债。盛宣怀对这并不介意，他对郑很有信心，以为郑之入局“必于商务有益也”。在当时，太古对招商局的威胁很大，而“太古所恃潮帮生意彼所独有”^[24]。要与太古竞胜，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把潮帮生意揽过来；从局部说，“汉口生意向以粤帮为大宗”，汉口太古拉拢粤人为之揽载，故盛宣怀认为“我局必宜兼用粤人”以与太古争载^[25]。郑观应既是粤人，又与潮帮的关系较深，手段也较灵活，所以盛宣怀说，“陶斋进（招商局）去可能稍用奇兵”^[26]以战胜太古。因此，盛宣怀“囑黄花翁（建苑）再三相邀”^[27]郑观应入局。

郑观应重入轮船招商局的原因是比较清楚的。简言之，招商局处于竞争不利地位，需要有一位熟悉商情并有商战经验的人来挽回颓局。郑观应的经历和才干都能适应这个要求，是最理想的候选人。而郑与盛宣怀较长时期的密切关